

德国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

张 生

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另有少量联邦政府档案)是近年来发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的第三方档案资料。上世纪90年代初,部分内容经编译后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后收录在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2卷《南京大屠杀》中。后来,日本学者也发现一些相关资料。最近,我们又发现一些新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深化南京大屠杀研究,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德国档案涉及到当时德国外交部副部长魏茨泽克、驻华大使陶德曼、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德国驻华使馆书记官许尔特尔、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菲舍尔、德国驻华使馆参赞劳腾施拉格尔、德国驻日使馆参赞奈贝尔、德国驻日大使冯·迪克森、安全区和难民营官员约翰·拉贝、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爱德华·施佩林和京特等人。其中大多数人都亲身体验过大屠杀期间南京的地域生活。档案涉及的地理空间主要为南京、汉口、上海、柏林和东京,南京为档案所涉及事件的发生地,上海为留驻南京德国人士的休整地和对外传播的中心,汉口是对策中心及档案向德国国内集中的中转地,柏林为决策中心,东京是对日交涉地。

德国有关档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完整、客观地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罗森在日军攻入南京前,上了德国政府包租的怡和洋行“库特沃”号,事实证明,这并不安全,日军对“库特沃”号在内的英美船只进行轰炸,屠杀平民。罗森等人被迫到英国军舰“蜜蜂”号上避难,“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按:应指八卦洲)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像日本人说的‘肃清’,就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除了用机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杀人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①12月21日,罗森乘坐英国军舰前往上海,经过下关时,罗森“除了见到严重的破坏情况外,还见到了好多堆尸体——尸体穿的都是平民衣服”。^②1938年1月9日,罗森回到南京,他给德国驻华使馆外交部发送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其中有一篇提到:“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本月12日我的英国同事、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

①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1011/38。

②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7年12月24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8432/37。

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①

沙尔芬贝格跟罗森积极抵制日军限制外国人在南京行动自由的态度不同,但其报告中的南京大屠杀惨景仍然触目惊心。1938年2月15日,他在中山陵周边地区看到,“宝塔附近马路上美丽的垂柳全被砍光了,几乎所有的别墅都已烧光。我们无法进入这个地区,因为到处还有许多零星的尸体,已经发黑,被狗咬得残缺不全”。而整个南京城,尸臭熏天,“现在天气变化很大,像今天天气就很热,因为尸臭人们都不能上街”。^②3月4日,沙尔芬贝格报告陶德曼:“把尸体从城里运走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现在红十字协会已经获得准许把3万具尸体埋在下关,每天掩埋600具。尸体用草席包裹,只有两条腿露在外面,草席包里放有石灰,然后用车运走,埋在万人墓里,同样加进了石灰。据说已埋葬了约1万具尸体。”^③

对南京在经历大屠杀后被付之一炬,日本右翼有各种“检证”,但克勒格尔的证词非常清晰客观:“从12月20日起,日本人开始系统地烧毁这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成功地烧毁了约1/3,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业区,我们领地附近的各商店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见到的和被忽略掉的单个房屋。更有甚者,所有房屋事先

①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6—149页。

②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2月28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18/2174/38。

③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3月22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18/2608/38。

都被有计划地通过组织的队伍用卡车洗劫一空。”^①

施佩林是德国人士中年龄较大的,但他承担了需要许多具体救助行动的安全区总稽查一职。正如拉贝评价的,他精力充沛,“为了赶走闯入安全区百姓家里野蛮强奸妇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国平民叫去的次数远远超过 80 次。我赶走他们毫无困难”。^② 他的报告质朴无华,却是日军令人发指暴行的铁证:“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刘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③

除了救助直接遭受日军暴行的南京市民外,南京当时数十万市民的吃饭问题也是德国人士十分操心的大事。在拉贝致福田的信里,就透露了他们与不讲信义的日本当局交涉的艰难情形:“12月21日,我们委员会几位委员曾提请日本当局注意,目前供南京市民的粮食和燃料储备不足,并恳请有关当局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局势……正当我们和福井先生谈判时,负责这期间日军军需处的石田少佐主动向我方施佩林先生提出,他可以出售给我们较大数量的米和面粉用于救济。后来我们的克勒格尔和施佩林先生从石田少佐那里得到 5000 袋米和 1 万袋面粉的供货单,我们随即在 1 月 7 日向他订购 3000 袋米和 5000 袋面粉。石田少佐先生还

① 《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 年 1 月 28 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1508/38。

② 《德国驻汉口大使馆 1938 年 2 月 12 日编号 102 的报告附件》,德国外交部档案,2718/1789/38。

③ 《施佩林给罗森的信》(1938 年 3 月 22 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无。

答应卖给我们 600 吨煤供我们的粥厂使用。然而 3 天后克勒格尔先生为了大米的交货事宜去找石田少佐时,他得到的消息是,他们既不可以卖米和面粉,也不可以卖煤给我们。”^①

德国档案的内容并非全部由德国人士提供,事实上,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片就是在德国外交档案中首次发现的,它记述了夏淑琴一家和其他无数家庭的血泪史:“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5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是教徒,他刚打开门,立即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还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76岁的父亲和74岁的母亲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二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了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刀刺死,2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

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按:即夏淑琴)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里同她没有受伤的4岁妹妹待了

^①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福田的信函》(1938年1月14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无。

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她们在一只锅里找到的剩饭活命。”^①

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是大屠杀期间身在南京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他对大屠杀早期恐怖情形的目睹纪实也反映在德国档案中：“12月15日，外国的记者团从日军方面得到了乘坐日本军舰从南京前往上海的许可。后来经过决定，英国军舰也走同样的路线。我们接到了在栈桥附近集合的指示。由于到出发所需时间超出了预先的估计，所以我们决定在周围走走，顺便做做调查。我们在那里看到，日军在广场上把一千名中国人捆起来并让他们站好。然后将他们分批依次带走，把他们枪杀。是让他们跪着，开枪打穿他们的后脑。在场指挥的日本军官发现我们之后，命令我们立即离开。在此之前，我们观察到了一百次左右用这种方法进行的行刑。不知道其他的中国人怎么样了。”^②

德国人士的严谨是留存下来的德国档案无可辩驳的重要基础，他们记录的日军暴行都是亲历、亲闻、亲见的事件。与此同时，他们以德国利益为依归的“中立”，也说明他们并不是因为“亲华”而故意“丑化”日本，这反而加强了德国档案的证据效力。陶德曼就说：“日本现在正尝试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能实现的事情，即欲将中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消除白色人种在中国的影响。”与当时在华的绝大多数德国商人一样，他认为这“意味着破坏了我国规模庞大的通商活动，使我国在中国的投资受到损失”。然而他认为，“我们可以把‘希望’放到将来的政治可能性上”。^③

① 《马吉牧师拍摄的影片解说词》，附于南京办事处1938年2月10日报告（文号：2722/1113/38）之后。

②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6日于汉口），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1105/38。史密斯的演讲内容是其中附件，文号：2722/1106/38。

③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文号：2722/1470/3。

罗森说得更直截了当：“对我来说始终是德国利益至高无上。”^①

德国档案中保留的德国人士对南京大屠杀另一种后果的评析是特别令人深思的。陶德曼说：“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虚像。”“中国的未来将表明中国是否从这场‘炮火的洗礼’中找到通往民族最后复兴的力量。”^②罗森对美国驻日使馆武官卡波特科维尔表达的观点与此相通：“日本以暴虐的行为使中国人扎下了牢固的反抗心理，因此它必将毁灭自己。日本要失败，以自己的国家为战场进行战斗的中国人不可能向野蛮的侵略者投降。因为游击队是在同‘大猩猩’抗衡，因此‘大猩猩’必定要失利。所谓文化和文明的一切力量与共鸣，都寄予中国一方。”^③

(作者张生,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 刘 兵)

①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15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 第149页。

②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 德国外交部档案, 文号: 2722/1470/3。

③ 《卡波特·科维尔的南京旅行记》, [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南京事件资料集》, 第一册, 美国关系资料编, 青木书店, 1992年版, 第110-121页。